



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清华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

研究报告（总第 88 期）

Working Papers （No.88）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2018 年 07 月 08 日发布



# 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 **贸易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 **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 “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战略互补
  - 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 **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 短期：把握主动，以斗促合
  - 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 **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CCWE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

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

联系方式

电话：010-62797782

网址：[www.ccwe.tsinghua.edu.cn](http://www.ccwe.tsinghua.edu.cn)

## 报告摘要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

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 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 2018 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 6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798.6 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 301 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 2025 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 1 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 30 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表 1 中美前四次贸易战

时期	方式	焦点	声称的惩罚	占比	后果
1991.4-1992.1	特别 301	化学与药品专利、版权	针对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产品等 106 种产品列出了总共 15 亿美元的惩罚性征税	16%	《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加入国际条约和修改有关法律 《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
1994.6-1995.2	特别 301	执法，盗版，商标侵权	向 24 类、价值 28 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100% 重度惩罚性关税	13%	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中国承诺采取一系列执法措施
1996.4-1996.6	特别 301	盗版，执法	对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 3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0% 惩罚性关税	11.3%	《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对美出版物和音像制品进口不设限额，并大幅降低关税，设立合资企业等等
2005.4	中国货币法案	汇率操纵	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对中国出口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 27.5% 的惩罚性关税。	100%	2005.7：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资料来源：马弘（2018）

## 一、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 1.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sup>1</sup>，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sup>1</sup> 引自发表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2018年3、4月刊，由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 1775 年形成的，而是在 17 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sup>1</sup>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 17 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 5% 上升到 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 50 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 2017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 232 调查，还是 2017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 301 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 21 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

<sup>1</sup> 并非“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以美国实际利益为导向进行参与。

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 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 2025-2030 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 2020 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远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 2010 年至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 2020 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 2018 年至 2020 年年均增速不低于 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情况，6.43% 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sup>1</sup>，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 2050 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 33 年里保持年均 4.1% 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 2017-2025 年保持年均 6% 的增速，2026-2035 年保持年均 4% 的增速，2036-2050 年保持 3% 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 33 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 2050 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

**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 9.5% 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 1978 年的不足 2% 提升至 2017 年的 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 32% 下降至 2017 年的 25%；中国 GDP 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 12%

<sup>1</sup> 即当前英国、法国、日本的相对水平。

提升至 2017 年的 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7.2%，明显高于美国 2.1% 的年均水平、全球 2.5% 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 4.0% 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 至 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 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0.4% 提升至 2016 年的 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 5.5% 上升至 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sup>1</sup>。2012 至 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 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sup>2</sup>。**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 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 年，内需的贡献达到 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 2017 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 90.9%。2017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 2007 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

**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表重要讲话，就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困境等问题宣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航船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信心。2018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更凸显出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的博大胸怀和大国担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 66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 737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8%。其中，出口增长 12.1%，进口增长 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3857 家，增长 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 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 二、 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乌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

<sup>1</sup> 数据来源：WTO 数据库。

<sup>2</sup>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FDI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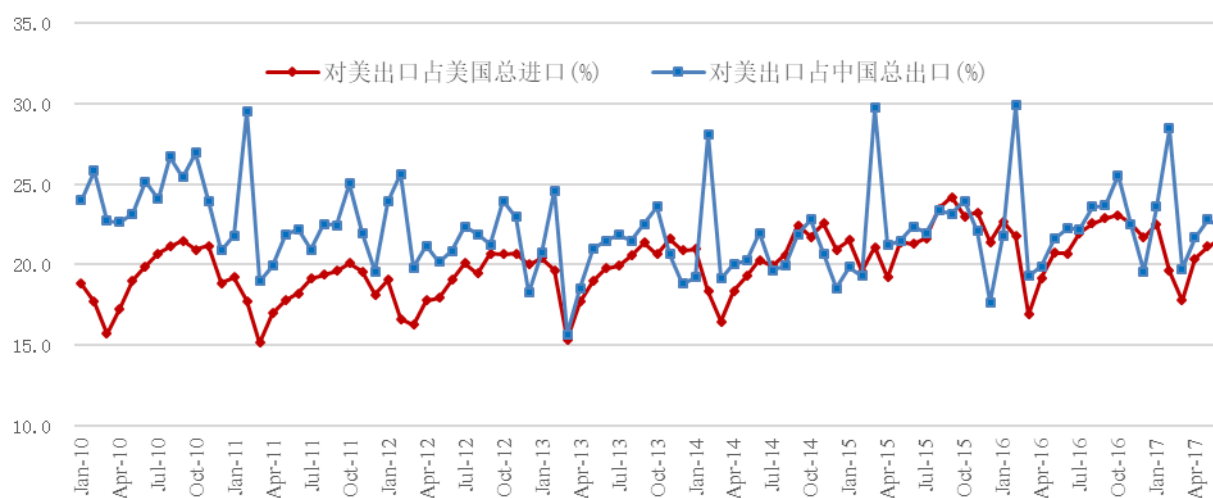
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

## 1.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2015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45%，为各个国家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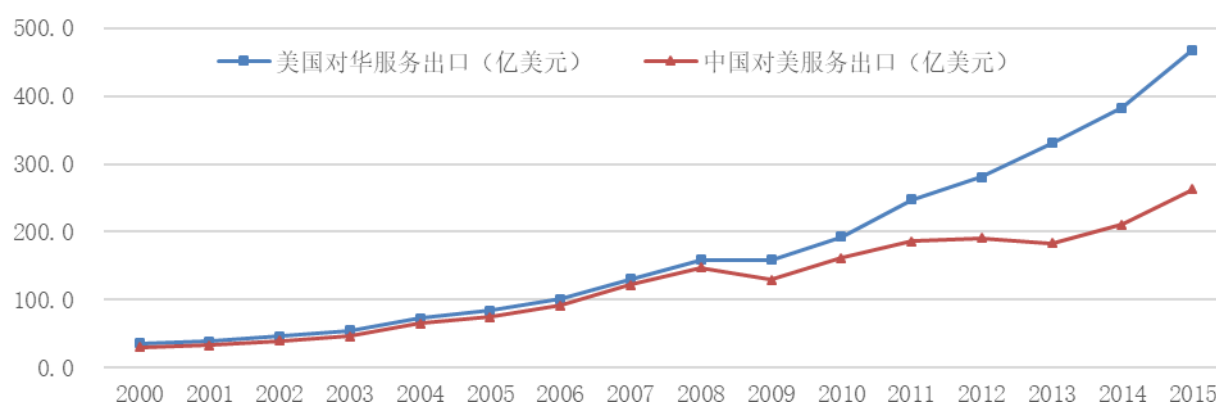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美双方贸易比例（2010-2017）



数据来源：商务部，UN Comtrade

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 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 12.5%。2016 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 4490 万部苹果手机，以及 510 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 21% 和 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 2015 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 304 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 3675 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 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 3752 亿美元逆差。

图 2 中美服务贸易增长迅速（20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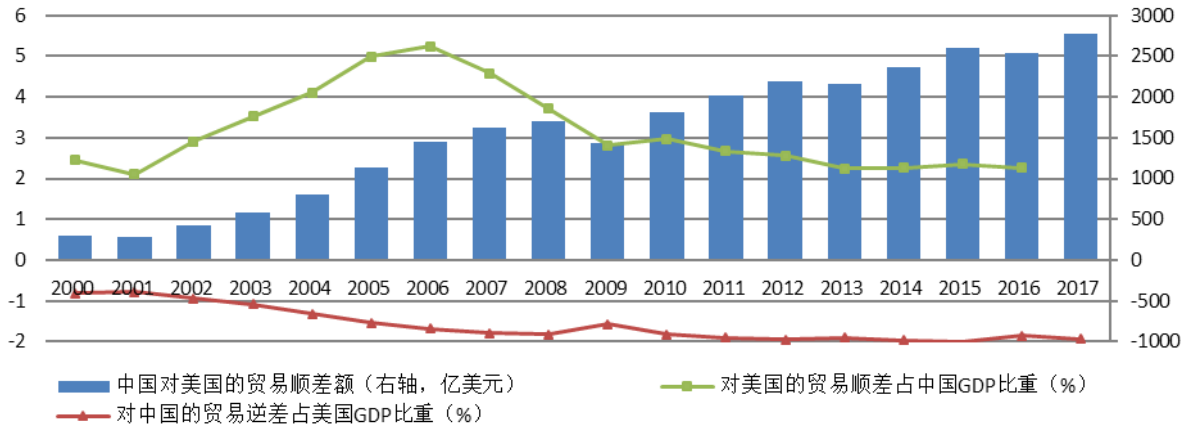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商务部，UN Comtrade

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 2000 年的 298 亿美元上升至 2017 年的 2780 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 GDP 的比重呈现倒 U 型走势，在 2006 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 5.2% 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 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仅为 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比重在近 20 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0.8% 提高至 2017 年的 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 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 10.8%，而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 18.9% 和 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 2001 年到 2017 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 2.6% 和 9.0% 分别上升至 8.4% 和 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20.2% 上升至 2017 年的 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 2006 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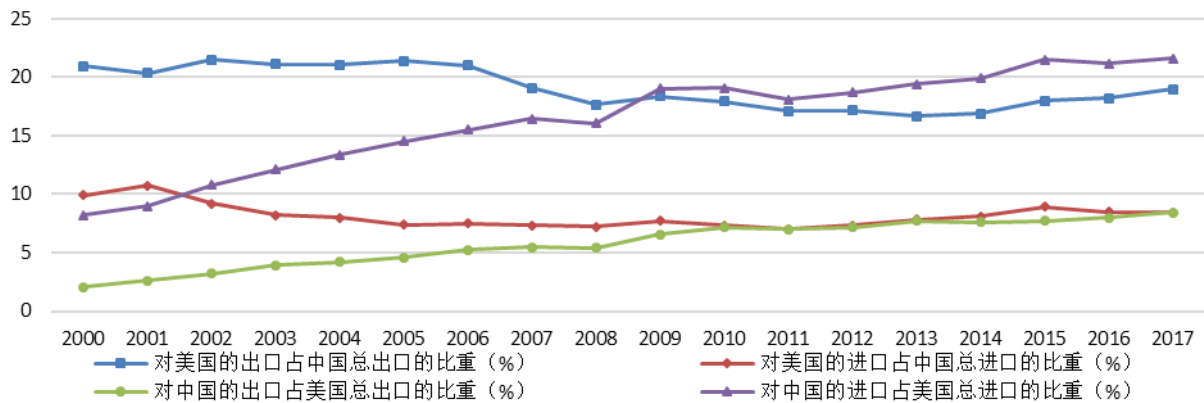
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63.5%。

图3 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额及其占中国和美国GDP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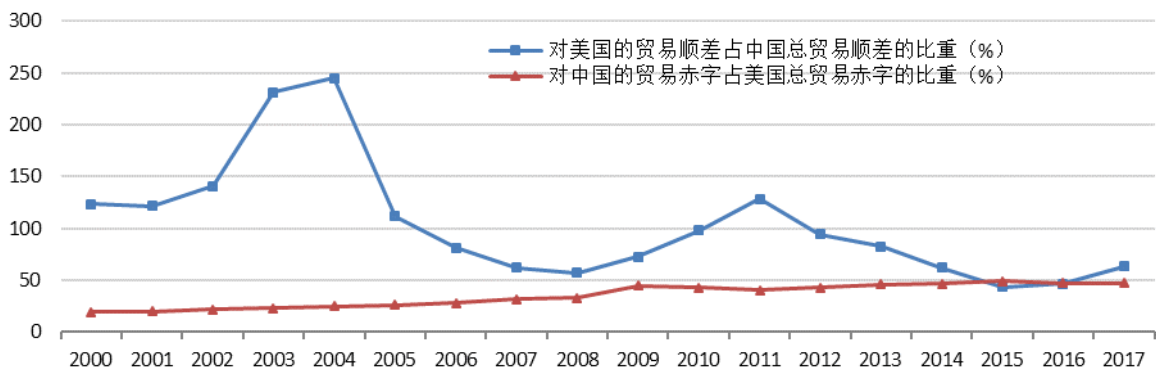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图4 中国和美国对对方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度对比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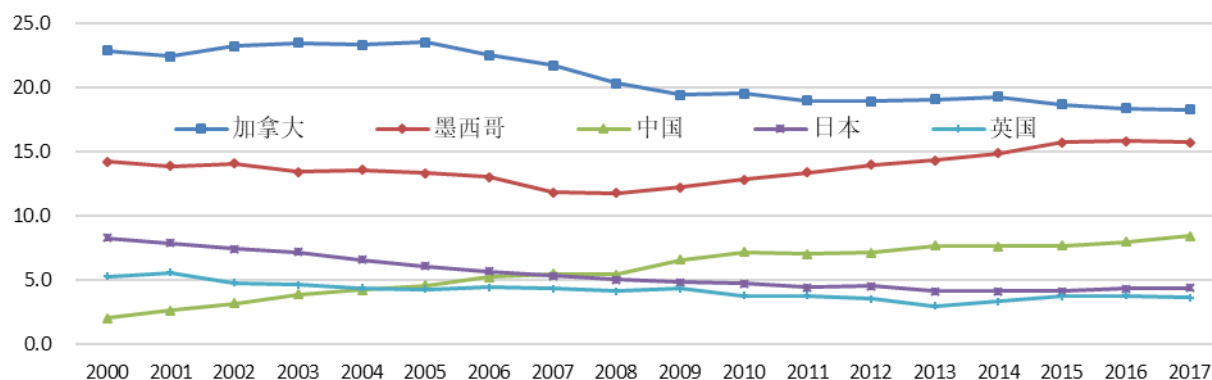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和美国对对方的贸易依赖度对比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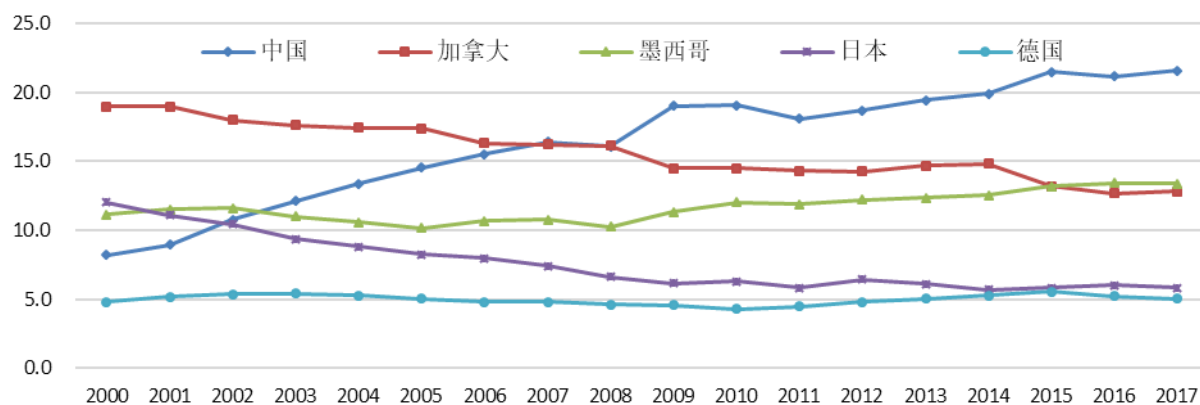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 2000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 6.9% 上升至 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图 6 美国对主要出口国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重 (%)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图 7 美国对主要进口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 (%)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

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 4500 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

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

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

## 2. “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

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至今设立上海等12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

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诉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

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一个神，使命都是宣

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20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6%-7%，远低于欧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sup>1</sup>。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GDP 191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sup>2</sup>。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

**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sup>3</sup>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7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

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没有优势的产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301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

<sup>1</sup>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

<sup>2</sup>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

<sup>3</sup>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

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 1840 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 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

### 3. 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 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 5056 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 1304 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 3% 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 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

**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 1 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 0.5<sup>1</sup>。给定中国不进行报复性反击，这一关税征收后，中国对美出口量将下降 11%，即 500 亿美元。目前中国的 GDP 为 12 万亿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

**情况二：美国加关税，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据近年来相关研究测算，中国进口价格弹性（即进口价格变化 1 单位所导致的进口数量变化）为 0.48<sup>2</sup>。倘若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水平的报复性关税，则中国净出口直接受影响将下降到 400 亿，对中国 GDP 增速的拖累将从不加报复性关税的 0.4 个百分点下降到 0.34 个百分点。

除了直接影响，我们还考虑了贸易战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乘数效应有限，由于企业短期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确定，贸易战的影响难以快速传递到投资方面。因此，**短期来看，中美贸易带来的冲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除了这种关税形式的贸易冲击，还需关注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惩罚措施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创造了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的记录。在以往，很多跨国公司违背了美国的相关条例都是罚款：BP，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罚款 208 亿美元；大众汽车排气门造假，面临最高 180 亿美元罚款；瑞银（UBS）也是被罚款。但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惩罚却完全不一样，不光要求中兴通讯承担巨额罚款，更是不允许中兴通讯购买相关的美国芯片产品，这等于是要把一家跨国公司掐死，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美国继续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施加此类惩罚，中国可以通过制裁苹果

<sup>1</sup> 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5, 23(6): 56-78.

孙刚, 刘旸.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6):92-98.

范金, 王艳, 梁俊伟. 中国进出口价格弹性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04, 26(4): 87-92.

<sup>2</sup> 此数据来源的研究为：

孙刚, 刘旸.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6):92-98.

等美国企业进行反击。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经济高度相容，这种行为恐怕两败俱伤。所以理性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诸如华为这类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予以禁售等惩罚措施，

### 三、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这种经贸关系的变化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应用底线思维，分析这种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给出详细的、能落地的可行性应对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动性；从长期来看，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给出政策建议。

#### 1. 短期：把握主动，以战促合

针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国”思维，从诸多的采访资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从青年时期就认为，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朗普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称：“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只能任人欺负”。因此，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讲经济理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维逻辑还具有典型的运营型企业家的风格，相比长远的战略，更重视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借助特朗普的特点，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湾和南海等问题，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

表 2 中美贸易量最多的产品列表（2017 年）

中国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列表	进口量（亿美元）	所属一级行业分类	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列表	出口量（亿美元）	所属一级行业分类
飞机和飞行器设备	162.7	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	通讯设备	826.9	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
油籽及含油果实	124.1	原材料（除燃料）	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	505.1	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
汽车	106.2	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	婴儿车、玩具、游戏和体育用品	262.5	杂项制品
热电子及冷极管	59.3	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	办公设备，数据处理机	153.5	杂项制品
沥青矿物提取油：原油	44.3	矿物燃料、润滑剂及其他	电机设备	141.3	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竞选周期，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无法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贸易战这张牌不断发酵，获得选民的期待，此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 2018 年 11 月之前，中国可能会中美贸易关系上承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提出的建议为：以战



促合，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坚决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贸易战极具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为中期选举后的实质性谈判争取筹码。

为了深入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将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探究在三级行业分类标准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由表 1 所示，中国对美国单项产品的进口量远低于对美国单项产品的出口量。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集中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其中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飞机、飞行器设备和汽车的进口都超过 100 亿美元。除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之外，进口量较高的产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属废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页岩气等矿物燃料。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主要分布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领域，其中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行业。2017 年中国对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通讯设备和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两者均隶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度在过去几年正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贸易战，重点针对对美进口较多的飞机、农产品和汽车进行反击。

然而，对我们而言，短期之内的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以战促合，“和”的目的是为了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以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例，2017 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 121 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 1210 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 300 万辆，则能缩小近 1000 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根据估算，2017 年底特律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北美地区的产量总计达到 860 万辆，而外资车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区的产量达到 870 万辆。因此，如果中国对美国开放汽车市场，不仅将受到全世界车企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需求将拯救底特律。作为特朗普而言，把“铁锈地带”重新拉回繁荣，无疑将使他写入美国的历史。

表 3 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原油进口结构变化

排名	2008		2012		2017	
	国家	占比 (%)	国家	占比 (%)	国家	占比 (%)
1	沙特阿拉伯	20.1	沙特阿拉伯	20.0	俄罗斯	14.6
2	安哥拉	17.4	安哥拉	15.1	沙特阿拉伯	12.7
3	伊朗	12.3	俄罗斯	9.3	安哥拉	12.1
4	阿曼	8.8	伊朗	8.1	伊拉克	8.5
5	俄罗斯	6.7	阿曼	7.2	阿曼	7.5
6	苏丹	4.9	伊拉克	5.7	伊朗	7.4
7	科威特	3.3	委内瑞拉	4.7	巴西	5.4
8	哈萨克	3.2	哈萨克	4.0	科威特	4.4
9	委内瑞拉	2.7	科威特	3.8	委内瑞拉	4.1
10	阿联酋	2.6	阿联酋	3.4	阿联酋	2.5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矿物燃料进口依赖度正屡创新高。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 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 250 亿美元，而 2017 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 31.5 亿美元。对美适当扩大原油进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国的进口能源结构，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能源依赖，

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从最主要的 10 个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的结构变化，由表可见，中国的原油进口集中度正在不断降低，2008 年从前五个和前十个原油进口国进口的原油占总原油进口的 65.3% 和 82.1%，而 2017 年对应占比则分别下降至 55.5% 和 79.3%。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 6 亿吨，其中 2017 年原油进口量突破 4 亿吨，而美国原油 2017 年年产量超过 5 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 OPEC 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 1 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将拉升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国国内更加清洁化地使用，在国内使用更多地天然气，对中国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国未来逐年增加油气从美国的进口，也将有潜力减小数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

由此可见，中国完全可以用汽车、原油和农产品为谈判筹码，去满足“传统的美国”，甚至超预期的为特朗普提升势头。通过这些措施平衡中美贸易，既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又能提升美国产能，解决产业工人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美顺差的减小，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将可能成为基于中国需求重新辉煌的城市，未来中国对美国势必会有着更多地筹码。

## 2. 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与历史上前四次贸易摩擦存在本质不同。这次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开始逐渐与美国相当，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而敏感；我们预计中国将在 202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中国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地区政治、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从长历史维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次贸易摩擦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标志着两点：一是中美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也面临调整。二是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剧烈调整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社会秩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这两个调整是客观上必然会发生、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阻挡、拦截不了的，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隐藏、躲避不了的。对此，中美两国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应当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争取主动，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向民众传递中美变化是本质在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导民众理性思考，避免民众情绪失控，严防类似于一战前夕萨拉热窝事件的突发性意外的发生。与此同时，那些一味自责，认为中美矛盾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导致的形势误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这种误判，认为美国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权，理性而合理，而中国则需要妥协。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偏见成为主流。

第二，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应当充分认识大国关

系调整和世界秩序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历史耐性，以平常心谨慎应对经贸摩擦，不急躁，不冒进，意识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应激性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无端指责和非分要求所干扰。要灵活适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贸易冲突扩大化，尤其须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式的意外事件发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

**第三，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经常账户适度顺差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健、汇率稳定、主权信用坚挺的重要保证。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1649亿美元<sup>1</sup>，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7年的8.6%下降至1.3%。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相对规模是适度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而言的对外失衡问题已经化解。未来应当将经常项目顺差/GDP维持在1%-2%上下，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同时要谨慎管理资本账户，严密防范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触发金融危机。

**第四，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美国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区域政治关系和经贸环境。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近邻的经贸关系如何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较为复杂，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应当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机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层次。既要加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积极运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拓展合作。

**第五，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所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运、河运可能出现瘫痪外，部分制造业领域和居民取暖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为此，要重点维护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库曼斯坦等油气来源国，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油气通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互利关系和战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是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在科技人才招聘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员的激励**。二是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其所发明的专利，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

**第七，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运行。加快低效“僵尸企业”退出，释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主体<sup>2</sup>。

**第八，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的社会矛盾。**建议启动“二次房改”，

<sup>1</sup> 数据来源为《2017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sup>2</sup> 详见《CCWE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8年6月。

探索实行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sup>1</sup>。建议中央加快房产税框架的立法，并授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细节。同时，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两个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避免社会撕裂。

**第九，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对此进行系统地理论总结，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长远目标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总结写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sup>2</sup>。如此，既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助于让西方精英理解中国，并逐渐打消疑虑、接纳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

## 四、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本质是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这一轮的经贸甚至其他领域的摩擦，**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稳定期，而这种新的稳定期既不是双方全面对抗的结果，也不是中国妥协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美国要接受，中国 13 亿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无法强行去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过去在摸索，有过坎坷，但是现在这条道路已然清晰，中国将自信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时，美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不强加于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历史上强大的中国虽然对当时的弱小邻国有过嘲讽，但是却从未要求别人强行接纳中国的理念；而历史上的基督教扩张，更多的是凶悍的同化。同样在当下，中国也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去接受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这是美国必须要理解的。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而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力、影响力必然会更加不断加强，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北亚甚至东南亚。中国的军事力量或许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边地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一点美国也必须接受。美国航母肆意驶入台湾海峡，在南海随处游弋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式，中国将在周边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

<sup>1</sup> 详见：张双长、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分析——基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视角[J]. 财政研究, 2010(7): 5-11。

<sup>2</sup> 详见：李稻葵、李雨纱、张驰，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学贡献？——基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与思考[J]. 经济学报, 2018(1): 1-16。

**型领导力。**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也许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却是共利多赢的，绝对不是那种强迫他国的声音。美国也许不喜欢中国的这种改变，但是需要逐渐去接受。**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也同样会在这一过程中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帮助美国更好的发展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锈带地区”，帮助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能受益，让这些美国人也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缓和美国的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将继续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作用将会是共利多赢的。

这“三个接受”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背后所影射出的中美关系变化的痛点，也是未来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走向稳定期所必须要经历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三个接受”并不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最终会接受这三条**。我们认为，美国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内向内省，反求诸己，调整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促进“两个美国”裂痕的弥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华尔街、跨国企业为代表的“精英美国”与普通中产阶级、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平民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两个美国”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也不可能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而得到弥合。**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是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经济结构的产物，本质上是其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sup>1</sup>。妄图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来减少美国贸易顺差是缘木求鱼，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曾对日本采取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结果只是将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日本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又转向了中国，美国对外的整体贸易赤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内向内省，反求诸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我们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领悟学习这一智慧，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指责外国。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弥合“两个美国”之间裂痕。

**二是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理解，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承认发展模式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两百多个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而**世界也恰恰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美好**。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就会有所差异。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脚都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道理，不同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恰恰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各界应当加强交流互动、加强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相比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而言，美国各界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因此**我们尤其建议美国政策解和学术界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中国经济、剖析中国模式，从而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合作关系进行总结，中美两国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而理性分析下，中美不会在当下走向全面对抗。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是中国在发力，在经历磨合的阵痛，是冲破困境走向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道路中的必经路途。**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sup>1</sup> 以数据可得的 2016 年为例，美国存在 5212 亿美元的“储蓄-投资缺口”，于是只好通过净进口的方式从国外“借用”，相当于当年美国 GDP 的 2.8%。这部分借用来的货物或服务就形成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

## 免责声明

此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未经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认为可靠，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何责任，除非该等损失因明确的法律或法规而引致。并不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学者或研究人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b>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b>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 128 室（100084）
电话:	(010)62797782
传真:	(010)62797782
网址:	<a href="http://www.ccwe.tsinghua.edu.cn">http://www.ccwe.tsinghua.edu.cn</a>